

罗素，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他于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在英国讲学，发表影响整个时代的《五大讲演》，传播启蒙思想，崇尚民主与科学，同时也引发了不少争论和思考。回国半年之后，他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中国观，体现了他对中国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以及代表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终极关怀。本书全文收录了当代读者已经久违了的《罗素五大讲演》以及其余几篇重要讲演，节选了《中国问题》的重要章节，并收入了从五四文化名人到当今学者的评论，全方位地反映了罗素的中国观以及中国对罗素的认识过程。

罗素

谈中国

LUOSU TAN ZHONGGUO

沈益洪 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世纪回声

SHIJIHUI SHENG



罗素 谈中国

LUOSU TAN ZHONGGUO

沈益洪 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特邀编辑:夏 雨

封面设计:池 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素谈中国/沈益洪编.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1. 1

(世纪回声书系)

ISBN 7-5339-1365-5

I. 罗... I. 沈... Ⅲ ①罗素,B. (1872~1970)
-演说-文集②罗素,B. (1872~1970)-访华观感-1920
~1922 N.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9399 号

· 世纪回声 ·

罗素谈中国

沈益洪 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飞达工艺美术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2 字数 325000 印数 0001—5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365-5/I · 1219 定价:20.00 元

出版献辞

20 世纪的帷幕正在徐徐落下,新世纪的曙光已经照临了人类的窗口。

20 世纪的中国接受过不少新思潮、新观念,这些新思潮、新观念曾经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 20 世纪的中国。

从五四时代起,有一批大师不远万里,亲临中国,通过讲演、谈话和著述,带来新学说,传播新思想,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让我们有幸目睹他们的风采,倾听他们的指点。

他们是大师,是 20 世纪的文化名人,他们更是朋友。他们都抱有中国关怀、中国情结。在我们彷徨不定的时候,他们为我们授课讲学;在我们遭受异族欺凌的时候,他们为我们呐喊奔走;在我们取得成绩的时候,他们为我们欣喜鼓掌;他们的到来,本身就是一种热潮、一种力量。他们坚定的目光、自信的话语、超人的学识,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伟人: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鲁迅……也曾激动过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热血青年,不少青年后来也成为了大师。

他们的学说盛行一时,影响深远,曾经引起过轰动,也引发过争论和思考……

是的,他们与 20 世纪的中国密不可分。或许他们的指点并不十分准确,但历史会记住他们的真诚。

此刻,我们正步伐坚定地迈向 21 世纪。我们不妨把回眸的

目光暂时集中在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大师身上,他们的名字是:内山完造、杜威、罗素、泰戈尔、萧伯纳、萨特与西蒙·波娃。

我们收录他们的讲演和谈话,记录他们在华活动的行迹,选录当时及之后的种种评论。我们没有对这段历史中的是非曲直作出评说,只是试图较为客观、真实地复原这段历史。我们相信,有兴趣于此的读者,自会从这臧否声中,感受到时代风云的拨弄,思想文化观念的撞击,以及与当下生活的或隐或显的联系,从而有所感悟,有所心动。我们愿以此来纪念这些大师,纪念我们共同经历的这段风风雨雨,纪念将要逝去的 20 世纪。

为此,我们盛情推出“世纪回声”书系。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

罗素与中国(代序)

罗素是五四时代继杜威之后,来华讲学的又一位大家。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生于英国贵族家庭,1889年获剑桥大学数学奖学金,1890年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895年任三一学院研究员,1908年入选皇家学会会员,1910年任三一学院逻辑和数学原理讲师,1916年因参加反战活动受起诉而被三一学院解职,1918年因发表反美言论而坐牢6个月,1920年访问苏俄,1920年至1921年访问中国,1938年被聘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访问教授,1939年被聘为美国加州大学哲学教授,1944年任三一学院研究员,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因参加反核示威以90岁高龄坐牢,1970年去世。

罗素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贡献在数理逻辑、自由教育思想与和平主义思想。曾在访华结束之后,于1922年出版《中国问题》一书。

罗素的访华日期是1920年10月12日至1921年7月11日。罗素访华虽然比杜威晚了一步,但他的影响并不在杜威之下。如果说,“五四”知识界迎来了两位贵客的话,一位是杜威,另一位便是罗素。杜威与罗素曾在湖南见面,他们的哲学观念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各自的劲敌,在个人交往上也谈不上喜欢对

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重大问题上采取一致立场,比如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他们曾联名向全世界发表公开信和公开宣言,严厉谴责日军的暴行,并向国际社会呼吁和平。同时,杜威也曾多次帮助过罗素,为迎接罗素访华,杜威专门作了《现代的三个哲学家》的权威讲演;罗素在中国病重时,杜威也曾帮忙寻医问药;乃至后来罗素赴美讲学遇到麻烦,杜威又站出来为罗素说话,颇有“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会拼命维护你说话的权利”之风。巧合的是,罗素与杜威于1922年7月11日同时离开中国——这一天,中国知识界同时送走了两位客人。

邀请罗素来华的,是梁启超,邀请函于1920年5月发出。罗素来华前,他的不少著作,如《社会改造原理》、《政治理想》、《自由之路》等均已中有译本出版,报刊上也发表了不少介绍他的文章,以及他一些重要著作的梗概。加上杜威的介绍,罗素尚未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已被誉为“新时代的大哲”和“世界哲学泰斗”。北京还成立了“罗素学说研究会”,出版《罗素月刊》。

罗素来华之后,也作了五大讲演,分别题为《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之分析》、《数理逻辑》和《社会结构学》。讲演地点大多在北京大学,只有《哲学问题》1920年11月14日之后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行。听众多达1500人,场面十分热烈。除了这五大讲演之外,罗素还马不停蹄地上海、杭州、南京、长沙、保定等地作了多场讲演。

《哲学问题》,罗素本来有专著问世,他在讲演中也有所发挥。他从“现象与实体”出发,深入浅出地讨论了唯心论、唯物论的来龙去脉,以最新的科学发展为依据,着重探讨了物质、心理、真理等问题,对于“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中国知识界,无疑如久旱之后逢甘霖。

《心之分析》也是一个系列讲座,几乎与《哲学问题》同时举

行。顾名思义,这个讲座的内容倾向于心理学。罗素着重介绍了本能、习惯、欲念、感情、记忆、想象等心理学范畴的问题,并介绍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最新理论。

《物之分析》,则着重介绍了相对论和量子论。由于这部分内容相对艰深,能听懂的人不多,因此讲演次数相对少一些。

《数理逻辑》是罗素的专长,他介绍了数理逻辑的一些基本概念,可惜只讲了两次,因罗素患病而匆匆结束。

《社会结构学》或许是中国听众最感兴趣的,但罗素并没有从中国的现实政治着眼去谈“社会改造”,而是偏重于理论上的阐发。

毫无疑问,中国的听众对罗素是失望的。

正如罗素在 1920 年 10 月 18 日的信中指出的那样:“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尽管罗素曾经表示,他来中国,并不是研究中国哲学,而是研究中国社会状况(见杨端六《和罗素先生的谈话》),但刚来中国的罗素,显然无法给这种急切的提问以一个满意的、现成的答案。对报纸上出现的罗素主张教育和实业而非社会主义,陈独秀曾给罗素写信询问,但没有收到回信。毛泽东在湖南听了罗素《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讲演,同样也感到失望,他在 1920 年 12 月 1 日写给蔡和森的信中说,他对罗素的主张的评论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罗素在中国的一系列讲演中,也阐述了一些对中国现状及未来的看法,他充分肯定“少年中国”的进取精神,认为“现在中国的青年,颇富于进取的精神,是件可喜的事”。对于西化问题,他认为“中国人要不去专事摹拟西方的方法,始可为自己的国家或世界图谋幸福”。在谈到如何对待中国旧文化时,他又重申:“既不要盲从西方的文化,也不要保存中国残留的文化。”他主张

中国办教育、办实业,提倡爱国精神、公共精神和民主精神。

罗素回国后,曾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文章,阐述了他的中国观。1922年,他在经过半年的思考之后,出版了他惟一一部关于中国的专著《中国问题》,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看法,又一次呼唤中国重视实业、重视教育,呼唤“少年中国”的崛起。与此同时,他又立足西方立场,谈了中西文化的对比和中国人的性格。该书集中体现了罗素在中国问题上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以及代表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终极关怀。

《中国问题》一书,对后世的中国研究影响颇深。中国问题专家C.P.菲兹杰拉德评论该书具有“犀利而又敏锐的远见卓识”,“无论从哪种角度看,它都是一部出色的著作”。曾经为“从罗素”而不顾一切去英国的徐志摩,收到罗素赠书之后,也撰写专文予以赞赏。孙中山先生则在1924年初撰写的著名的《民族主义》一文中,评价罗素是真正了解中国的为数不多的几位西方人之一:“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除非在中国住了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者是极大的哲学家,像罗素那样的人,有很好的眼光,一到中国来,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超过欧美,才赞美中国。”

罗素本人也十分重视这部著作,曾在晚年(1966年)将它重新出版,并撰写了前言。

罗素访华,给中国留下的回忆还不止这些。比如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的国粹、关于西化的观点,曾引发了五四时期著名的思想论争;比如他的访华,备受英国当局的阻挠;比如他并不像杜威那样与妻子、女儿同行,却是带着一个尚未结婚的情人;比如他在寒冷的冬天作演讲,坚持脱去外衣以示礼貌,却因此重病一场,甚至读到了自己的讣告;比如他游览西湖时看到轿夫“含笑”而发出的感慨,却引起了鲁迅先生的评论;比如为他作翻译的赵元任因随他在中国各地旅行而发现自己的语言天赋

进而成为语言学的一代宗师……最主要的是，罗素给中国留下了太多的思考。

罗素对中国的态度一直十分友好，自幼便从父辈的藏书了解并向往中国文明，他曾于 1922 年表示“愿为中国竭尽微诚”，曾不断撰文“为中国请愿”。在国际问题上，始终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谴责列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并在 1962 年中印边界问题上，担任中印双方的调停人，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也十分尊重这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代哲人。几十年来，罗素的重要著作也在中国有了译本，甚至多个译本，在中国深受欢迎。中国著名翻译家傅雷曾翻译过他的《幸福之路》。

本书全文收入了罗素的“五大讲演”，以及他的另外三篇重要讲演，这些讲演，已经多年未见刊行。罗素观点的正谬何在，他让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们感到失望的原因何在，从中可见一斑。此外，我们节选了《中国问题》中的几个重要章节。我们还收录了罗素在华时和离华后的几篇重要评论文章，书后附有罗素在华演讲的目录。

我们愿以此来纪念罗素访华、纪念罗素对中国人民的友谊、纪念这段丰富的历史，并愿以此献给 21 世纪的中国人。

沈益洪

2000 年 2 月

于上海大学文学院康桥作坊

目 录

罗素与中国(代序).....	沈益洪(1)
----------------	--------

罗素五大讲演及其他

哲学问题.....	(3)
心之分析	(86)
物之分析	(195)
数理逻辑	(243)
社会结构学	(253)
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	
——罗素在湖南讲演	(309)
布尔什维克的思想	
——罗素在北京女子高师学生自治会讲演	(315)
中国的到自由之路	
——罗素临别讲演	(321)
中国问题(节译)	(331)
二、中国的种种问题	(331)
三、中西文明的对比	(338)
四、中国人的性格	(347)
五、中国的前途	(356)

评论:罗素在华时

罗素与国粹·····	周作人(367)
和罗素先生的谈话·····	杨端六(370)
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	张东荪(378)
独秀致罗素先生的信·····	陈独秀(379)
毛泽东致蔡和森等的信·····	毛泽东(380)

评论:罗素离华后

罗素与中国

——读罗素著《中国问题》·····	徐志摩(387)
罗素又来说话了·····	徐志摩(393)
为罗素任翻译及结婚·····	赵元任(403)
我的父亲——罗素·····	凯瑟琳·罗素(413)
让人为难的罗素·····	朱学勤(418)

罗素在华演讲目录·····	(431)
---------------	-------

罗素
五大讲演及其他

哲学问题

瞿世英 笔记

我这个记录,有许多地方是以孙伏园兄的记录作参考,特附志于此。至于文中小注亦是我注的,为的是可以略略将罗素讲演内所引用的哲学家的一生和重要的著作介绍给读者。

诸君:

我这个讲演的题目是哲学问题,或可说是与哲学有关的几个问题。哲学与别种科学不同。它不能贡献一定的知识,如别种学问所能贡献的一样。“哲学”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意是“爱智”,它所爱的是“智慧”(wisdom),不是“知识”(knowledge)。研究别种科学的结果,总是研究得越多则知的也越多;而哲学则研究得越多,所知的反而越少。研究哲学的结果竟减少许多的“自信”。从前不会发生问题的,却都要发生问题了。哲学的价值,固然不只在这一点,但减少自信或偏见,也是哲学的一个功用。世界上许多战争冲突,及种种惨事,其起因都不过是这边相信这种学说那边相信那种学说的结果。

现在讲到本题,世界上究竟是否有一个一定不错的知识?我以为是有的,不过很不容易求得;平常以为求即得之的,其实

必须费去许多研究才能得到的。有许多明显的事，如地球是圆的，二加二等于四，看似一点不用疑惑的，其实要明白其中真理，也不是随便可以说得出。你们对于知识，如果能知道要求将来造成知识的基本，那已是哲学的精神了。哲学的精神，便是要求知识基本的难处。今日就讲这个问题，就是现象(appearance)与实体(reality)的关系。

常识以为真确的事，在哲学上未必是真确的；因为这些事，稍加思想，便立刻发生了许多疑难和矛盾。所以有许多哲学家以为“实在”与所见的现象是不同的。现在且不必空说，先归到具体的事，再研究一下。即以这张桌子而论，你们虽然都看见，但我可以证明你们并不看见。我们倘要把这所见的桌子弄清楚究竟怎样，便可知道各人所见的不同了。这边的人看去是这个颜色；那边的人看去，因为反光的缘故，桌子的颜色便不同了。平常人所说的桌子，只是当它放在一个平常的地位，平常的情形，从普通的观点看去。倘若叫画家来看，就不与常人相同；常人所谓黄的，他也许不以为黄，他只知道看去什么便是什么。因为许多桌子的观念不同，那桌子也就不同；倘于其中选出一种颜色来说，这桌子是什么颜色的，那么，别种不同的颜色不是都要叫冤吗？若说各种颜色全都有，又未免不合理。所以有许多哲学家以为颜色的不同在乎主观的观察，而非实在的本体。

颜色之不能定规，固如上述；但别的性质，也都与颜色一样的麻烦。比如论到桌子的样式，说是长方的，而长方的四只角都是直角。但当小孩画起桌子来时，倘画上四只直角，便不像桌子了。细心看去，那四只角并不都是直角，却是两锐角和两钝角。桌子的大小，也不是一定的：近了大，远了便小了。故样式也与颜色一样，若要偏说它是长方的，那其余的别种样式便又要呼冤了。我们若把它的“好像”什么便算什么，或说这桌子同时也是长方的也是不长方的，如何能行呢？

再讲到桌子的材料。我们平常肉眼只能看见它的纹理,但若是用显微镜一看便可见桌面上的高山深谷了。平常人总以为肉眼是不对的,用了显微镜,一定真确了,然而再有更好的显微镜,便又不同了。从此看来,我们不能说桌子一定怎样,就是不能把桌子的“好像”当作它的“实在”。

讨论到这个地方,我们有两条出路:(一)天下没有桌子的“实在”这样东西,只有黄的、亮的、硬的等等“现象”。(二)有,但与现象不同,它是隐伏的原因,从它生出现象来的。

旧的科学同哲学,以为桌子是有的,不过与现象不相同。但是,近来的物理学家同哲学家,以为用不着那些看不见听不着摸不到的桌子,只要有现象就够了。科学中讲到宇宙的样子,是很奇怪的,不是常人所知道的;它本应越接近常人的见识越好,但讲来如此奇妙,是没有办法的事。科学说桌子是分子造成的,分子是原子造成的,原子是电子造成的。电子非常小而且动得非常快,各个电子距离,又比电子的本体还大;放大来看,电子与电子的距离,正如各个行星的距离。所以,这桌子实在是空的。我靠在这百分之九十九是空的奇怪桌子上面,要是人小了一点便要往空处掉进去,如彗星行在各个行星中间一样。

上面所说的是科学的理论,但不是最后的理论;科学并不是要奇怪,不与常人见识相近,但它实在与常人所见不同,要近也不能再近了。科学所贡献者如此;倘先知道了这些科学的理论,再去看哲学中的古怪理论,便不觉得十分古怪了。我们可以进一层问:世界上究竟有无物质?所谓物质,有无实在的本体,可为现象的原因的?人家可以说,各人的观点虽然不同,但总须有个东西才行,这个东西,就叫物质。

所以这里发现两个问题:(一)世界上究竟有无物质?(二)倘若有的,它的性质如何?用什么法子知道它的性质?这两个问题,在这讲演中,我后来可以有几条解答,但此刻还不能讲,因